

大屠杀记忆、以色列战略 文化与伊朗核危机

汪舒明

摘 要 大屠杀记忆是当代犹太民族集体认同建构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以色列理解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棱镜”。它塑造了以色列战略文化中的关键特征：恐惧与攻击共存，倾向于从最坏处着想，注重和依赖军事权力，倾向于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来应对生存性威胁等。它使以色列将伊朗核项目解读成对以色列生存构成“大屠杀式”威胁的因素。而伊朗政府不明智的否定纳粹大屠杀的激进言论，正好激发了犹太民族根深蒂固的生存焦虑和威胁认知，从而加剧了伊朗核问题的危险性。以色列在这一问题上从最坏处着想的倾向，使得现实主义的核威慑理论变得不太现实。由于大屠杀记忆带来的愧疚和补偿心理，西方国家将严重关切伊朗核项目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并对包括先发制人打击在内的以色列强硬政策持更加同情的态度。

关键词 大屠杀记忆 以色列 战略文化 伊朗核危机 内贾德

自 2005 年出任伊朗总统以来，内贾德就一再发表质疑甚至否定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历史的言论，借以表达对以色列及西方的强烈憎恨。2005 年 12 月 8 日，内贾德在沙特宗教圣城麦加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一些欧洲国家坚称希特勒在焚尸炉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我们并不接受此种说法。”^①此后，他又在国际和国内的许多场合公开宣称，纳粹大屠杀是“欧洲国家制造的神话”，是西方国家的“谎言”，其真实性甚为可疑。2006 年 8 月，伊朗举办了“纳粹大屠杀国际漫画大赛”，以反击丹麦漫画家侮辱先知穆罕默德，但漫画内容主要为嘲讽以色列与犹太人。12 月，伊朗政府召开全球知名的纳粹大屠杀否定者和“修正者”的国际研讨会，伊朗外长亲历大会并致开幕词，内贾德本人则在闭幕式上做了演讲。

*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20）。

① “Iran’s Leader Voices Doubt on Holocaust”，*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9，2005.

除了质疑和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内贾德还将其与中东存在的一些其他问题相关联:第一,反对锡安主义(Zionism)和以色列在中东存在的合法性。早在2005年10月,他就在德黑兰召开了“没有锡安主义的世界”的国际会议,并宣称以色列是“可耻的污点”,应当“从地图上抹去”。2005年12月8日,他宣称,即使纳粹大屠杀为真,这也不是欧洲人支持(锡安主义者)占领耶路撒冷的理由,欧洲国家应当让锡安主义者在欧洲建国。此后,他又多次提出西方应当让锡安主义者在欧洲、加拿大、阿拉斯加建立国家。他还称纳粹大屠杀历史为英美掌控中东的借口。他在2009年9月18日的一次讲话中称,锡安主义政权建立的前提(即纳粹大屠杀)就是一个谎言,这个政权存在的时日可数,正在走向消亡。^①在另一次讲话中,他还宣称,锡安主义者的行为就像希特勒,甚至比成吉思汗更糟。第二,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他宣称,关于纳粹大屠杀仍然存在严重疑点,但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劫难和大屠杀却无可置疑。大屠杀在巴勒斯坦已经持续了过去的60年。他一再强调,巴勒斯坦人不应为纳粹大屠杀付出代价。第三,反对西方强权。在2011年9月23日联大会议的发言中,内贾德全面抨击西方国家的强权在世界各地制造灾难。他提出,既然欧洲国家以纳粹大屠杀为借口,向锡安主义者提供补偿或赎罪金,那么,(西方)奴隶主和殖民强权同样需要为受害民族提供赔偿。^②

在内贾德出任总统以前,伊朗官方也有一些否定和质疑纳粹大屠杀历史的言行。但在内贾德任内,伊朗变得更加激进高调,在否定纳粹大屠杀方面呈现出“大跃进”态势。^③这些言论,一方面迎合了伊朗国内保守派的反以、反西方情绪,有助于提升内贾德政府在国内的政治支持率,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内贾德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有助于提升其在伊斯兰世界的支持率。

但这些挑战和否定纳粹大屠杀记忆的言论,既不利于伊朗自身国际形象的提升,也不利于其安全地位的改善。无论犹太人和以色列,还是西方大国,都将伊朗否定大屠杀的言论与其持续推进的核项目进行了极其负面的关联和解读。以色列一再发出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强硬言论,也在开展军事打击所需的各项准备。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也积极对伊朗“以压促谈”,并且宣称不放弃军事选项。围绕核问题,伊朗与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矛盾持续升温,正在走向最终摊牌的临界点。

国际社会介入并关切伊朗核危机,或出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考量,或出于本国地位和安全的现实考量。但与其他国家的理性和现实立场不同,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对这一危机的态度还明显受到大屠杀历史阴影的影响,带有明显的非理性的

① Ian Black, “‘Death to the Dictator’ Chant Protesters as Ahmadinejad Denies Holocaust”,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8, 2009.

② Kourosh Ziabari, “Ahmadinejad’s UN Speech: The Unanswered Questions”, *Tehran Times*, November 28, 2011.

③ Matthias Kuntzel, “Creative Desecration: Iranian Holocaust Denial and the Internet”, *Australia/Israel Review*, Vol. 37, No. 3, March 2012.

情绪性因素。本文不揣浅陋,以大屠杀记忆为主要视角,分析其对伊朗核危机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大屠杀记忆对犹太民族的集体心理以及以色列的战略文化有何影响?第二,大屠杀记忆如何影响以色列对于伊朗核问题的威胁认知?以色列为何不顾世界各国的普遍反对和疑虑,一再发出战争威胁?第三,大屠杀记忆如何影响西方国家(如美、德等)对于伊朗核危机的认知和政策?

一、大屠杀阴影下的以色列战略文化

纳粹大屠杀给犹太民族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创伤和历史阴影,是犹太民族认知人类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棱镜。20世纪末期以来,纳粹大屠杀记忆已经成为全球犹太人建构犹太认同的核心要素之一。它使犹太民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心理,也使其政治意识(尤其对权力的认知和态度)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它导致犹太民族“重归历史”,唤起以民族权力求生存和安全的强烈渴望。^①

对集体灭绝的恐惧和捍卫群体生存的紧迫感,在纳粹大屠杀后成为犹太民族心理的重要特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规模灭绝带来的恐惧和震惊,使得犹太民族生存问题在许多犹太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在犹太神学家那里,以权力维护民族生存被提到了神圣高度。1967年春,年轻的犹太神学家艾米尔·法肯海姆提出了一条被称为犹太人的第614条戒律^②的“绝对律令”：“真正的犹太人禁止给予希特勒死后的另一个胜利。他们必须作为犹太人生存下去,以确保犹太民族不会消亡;他们必须记住奥斯维辛的受难者,以免记忆消失;他们不得对人类和世界绝望从而遁于玩世不恭或消极避世,以免这个世界重新落入制造奥斯维辛的力量之手;他们不得对以色列的上帝绝望,以免犹太教消亡。”^③这一戒律很快被人们简化地理解成“犹太人需要首先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利益,即使以对他人的社会责任为代价”。^④以色列社会尤其存在一种马萨达^⑤式的“围困心理”,对安全威胁的敏感往往达到病态的程度,而且对威胁倾向于从最坏处着想。纳粹大屠杀在心理上塑造了以色列,它产生了一种感觉,即犹太人处于即将灭绝的威胁中。^⑥其狭小的疆域,更

① 关于纳粹大屠杀对犹太民族权力观的影响,笔者在《纳粹屠犹与犹太民族的现实主义转向》(《世界民族》2010年第4期)一文中作了更加详细的分析。

② 犹太教法有613条律令。

③ Emil L. Fackenheim, “Jewish Values in the Post-Holocaust Future: A Symposium”, *Judaism*, Vol. 16, No. 3, Summer 1967; Emil L. Fackenheim, “Jewish Faith and the Holocaust: A Fragment”, *Commentary*, August 1969.

④ Michael E. Staub, *Torn at the Roots: The Crisis of Jewish Liberalism in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3.

⑤ 死海边的一座堡垒,坐落在一座孤立、四面峭壁的山上。公元1世纪,犹太人发动起义反抗罗马统治。一些起义者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据守这一险峻要塞顽强抵抗罗马重兵围攻长达数年之久。在力量悬殊、无力坚守的情况下,包括妇孺在内的起义者最终集体自杀。

⑥ Gershom Gorenberg, “Thank Again: Israel”,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8.

容易加剧此种安全焦虑。“以色列经受不起一次失败”,这样的意识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在本—古里安等领导人心中扎根。^①一旦出现严重的安全威胁,以色列社会的“灾难边缘”心理就会迅速抬头,将时下面临的严重威胁与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成为主导性意义架构方式。

外部世界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冷漠和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的孤立无援是一个被一再提起的话题。“六日战争”后,一位犹太知识分子这样评论道“我们再次明白了一个古老的真理,就是只有自己才可依赖,……只有自己才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②“他人善意无法信赖”的意识,一方面使得犹太民族在纳粹大屠杀后绝大多数变成了锡安主义者,对以色列产生了强烈的休戚与共感;另一方面则使以色列人对外部世界充满不信任感,因而高度倾向于通过增强并运用自身的权力,以自助的方式来解决自身面临的安全问题。这种自助心理也导致其经常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自行其是,呈现出明显的单边主义色彩。即使有美国的坚定支持和安全承诺,但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问题上,以色列并不会全然信靠美国。

痛定思痛,高度倚重权力正是纳粹大屠杀以后犹太民族深刻反思后的选择。对于灭绝的恐惧和焦虑,导致以色列通过追求和使用权力来减轻恐惧。恐惧与权力、恐惧与攻击在以色列对立统一,相互强化。^③在大屠杀后犹太民族“从灭绝到重生”的历史进程中,权力是犹太民族获得重生的体现和保障。著名的犹太裔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猛烈抨击此前欧洲犹太人盛行的自由理想主义和“和平科学”,强调权力在维护正义时的不可或缺性,“权力在,正义在。”^④这正是犹太民族的权力观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典型表达。犹太神学家鲁宾斯坦(Richard Rubenstein)走得更远,他在1968年夏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上帝死了,犹太人想要生存于赤裸裸的权力和暴力仍然盛行的世界而不像欧洲犹太人那样自我毁灭,就必须“拥抱权力”。^⑤

以色列所倚重的权力,主要就是军事力量。维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在以色列安全战略中处于核心位置。此种高度倚重军事力量的倾向,在争取以色列建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区别在于当时的锡安主义右翼宣扬“独此一途”(One this way!)将武力视为争取以色列建国唯一重要的力量,将权力狭隘地理解成武力;而左翼强调“还有此途”(Also this way!),既重视武力,也重视建设、移民和定居。^⑥对

① Shmulik Nili, “The Nuclear (and the) Holocaust: Israel, Iran, and the Shadows of Auschwitz”,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 4, No. 1, 2011, pp. 37—56.

② Milton Himmelfarb, “In the Light of Israel’s Victory”, *Commentary*, October 1967, p. 57.

③ Erel Shal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ression and Fear of Annihilation in Israel”,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5, No. 3, 1994, pp. 415—433.

④ See M. Ben Mollov, “Power and Spirituality in the Thought of Hans J. Morgenthau”,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X, Nos. 1—2, Spring 1998, p. 103.

⑤ Irving Greenberg, “Religious Values After the Holocaust: A Jewish View”, in Abraham J. Peck, ed., *Jews and Christian After the Holocaust*,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2, p. 135.

⑥ Anita Shapira, *Land and Power: The Zionist Resort to Force, 1881—19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49—350.

国际关系信奉霍布斯式的丛林现实主义,信赖以武力为核心的硬实力,而不重视武力使用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这正是当今以色列右翼和美国新保守派的一大共性,而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犹太民族的悲情历史观的影响。^①

这种对大屠杀的恐惧和“从最坏处着想”的心理,使以色列政府致力于建立和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核优势地位。早在本—古里安时期,以色列就将拥有核威慑能力视为确保不受灭绝的最大保障。到贝京时期,则进一步发展为确保不让对手发展、制造或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②为此,以色列相继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核项目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摧毁其核设施,以消除潜在威胁。

二、大屠杀棱镜下的伊朗核危机

在以色列看来,是否接受和尊重在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大屠杀历史的描述,不仅关系到是否尊重受难者,也关系到是否承认犹太民族的集体生存权利,尤其以色列在中东存在的合法性。承认纳粹大屠杀历史,包含着反对反犹太主义的期许。“永不再演”(Never Again!)的强烈口号,首先就要求不让集体灭绝在犹太民族再次发生。而否定纳粹大屠杀,摧毁纳粹大屠杀记忆,则被视为对受难者的二次谋杀以及灭绝行动的继续,同时,它还隐含着对重演纳粹大屠杀(即消灭以色列)的期许。

犹太人在内贾德等伊朗领导人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的言行中,抽象出了一个消灭以色列、妖魔化犹太人和否定纳粹大屠杀三者相互支撑、相互强化的逻辑结构。一位学者这样论析:任何人接受纳粹大屠杀历史事实,就不可能同时相信犹太人是世界的统治者;任何人据实接受犹太人,而不是妖魔化他们,就不可能对纳粹大屠杀事实提出质疑;任何人接受以色列安全存续的权利,就必然拒绝伊斯兰主义者纳粹式的反犹太主义。^③在这个逻辑结构中,否定纳粹大屠杀就成了反犹太以意识形态的关键一环。由此,此类言行必然在犹太人中重新唤醒灭绝噩梦,唤起历史或将重演的恐惧。

尽管伊朗领导人一再宣称其发展核项目出于和平目的,并不致力于发展核武器,但此类表述尚且难以取信于国际社会,更不能消除以色列的恐惧。反犹、灭以、否定纳粹大屠杀言论唤醒了以色列“从最坏处着想”的倾向,深刻怀疑伊朗核项目的和平目的,并焦虑地感觉灭绝的时钟正随着伊朗核项目的进展而滴答作响。如果国际制裁和外交谈判无望在以色列担心的时间节点阻止伊朗跨过“核门槛”,恐惧和焦虑支配下的以色列很可能再次铤而走险,不顾国际社会(甚至包括美国在内)反对,

① Ilan Peleg and Paul Scham, “Israeli Neo-Revisionism and American Neo-conservatism: The Unexplored Parallel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1, No. 1, Winter 2007, pp. 73—94.

② Shmulik Nili, “The Nuclear (and the) Holocaust: Israel, Iran, and the Shadows of Auschwitz”, p. 39.

③ Matthias Kuentzel, “‘Global Vision’: Iran’s Holocaust Denial”, in Alan S. Rosenbaum, ed., *Is the Holocaust Uniqu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pp. 231—244.

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

现实主义者考察以往伊朗的行为方式以及美苏核军备竞争的历史,认为即使伊朗拥有核武器,拥有二次核打击能力的以色列仍然可以对伊朗有效实行核威慑。因此,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虽然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引发核竞赛,但并不会毁灭以色列。以色列并未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①但“从最坏处着想”的倾向使以色列相信,伊朗领导人的灭以激进言论表达了其真实的意图,并体现为伊朗伊斯兰政权意识形态的固有内容。使以色列威胁认知强化的是 2001 年伊朗温和保守派总统拉夫桑贾尼的言论。他宣称,对以色列使用核弹将彻底摧毁以色列,而对伊斯兰国家的核打击将只会导致损失。^②内贾德等伊朗领导人否定纳粹大屠杀的相关激进言论,则进一步导致以色列将伊朗伊斯兰政权视为疯狂、邪恶、非理性的国际行为体。在最令人惊悚的图景中,伊朗被视为带有强烈末世论情结的国家,毛拉们愿意像殉道者那样对以色列实施自杀式核打击来迎接马赫迪的回归。^③由此,伊朗领导人在以色列社会认知中就被塑造成希特勒那样危险、邪恶的形象,而伊朗伊斯兰政权就成了当下的纳粹,伊朗核项目就成了“纳粹大屠杀式的威胁”。既然带有这样极端疯狂、非理性的特性,那么,进一步的结论就是,核威慑理论并不能适用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纳粹大屠杀棱镜由此使得现实主义的核威慑理论失去了现实性,无论以色列自身的二次核打击能力,还是美国的安全承诺,均难以消除以色列的安全顾虑。^④这种顾虑在以色列广泛存在,即使左翼的梅雷茨党(Meretz Party)也是如此,在以色列右翼阵营则更加强烈。

伊朗核计划对以色列构成生死存亡威胁的观点,导致全球各地犹太人也为之忧心忡忡。在美国,无论改革派还是正统派犹太人都将伊朗视为严重威胁。自“救助苏联犹太人运动”以来,相互分歧且竞争激烈的美国犹太组织之间重新找到了一个汇合点。^⑤内贾德上台以后,应对伊朗核问题带来的挑战,进一步被列入犹太社团的最高议程。美国犹太社团进一步动员起来,积极开展舆论攻势和密集游说,要求美国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对伊朗划出不可触碰的“红线”,在制裁仍然无效的情况下,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在 2007 年“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年度政策大会上,伊朗核问题成为主导性话题,发言者纷纷将伊朗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大谈“伊朗威胁论”。^⑥从 2007 年 3 月下旬到 2012 年 3 月 12 日,有着美国犹太社团的“国务院”之称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共发布了与伊朗相关的 47 条新闻(news),在主

① Gershom Gorenberg, “Thank Again: Israel”.

② Jeffrey Goldberg, “The Point of No Return”,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010.

③ Matthias Kuentzel, “‘Global Vision’: Iran’s Holocaust Denial”.

④ See Shmulik Nili, “The Nuclear (and the) Holocaust: Israel, Iran, and the Shadows of Auschwitz”.

⑤ Larry Cohler-Esses, “An End to ‘Apocalyptic Unity’”, *The Jewish Week*, April 12, 2007, http://www.the-jewishweek.com/features/end_%E2%80%98apocalyptic_unity%E2%80%9999 2007-04-13.

⑥ Larry Cohler-Esses and James D. Besser, “Apocalypse Now: Iran Threat Dominates AIPAC Confab”, *The Jewish Week*, March 16, 2007, <http://www.thejewishweek.com/node/4134>, 2007-03-17.

流媒体上发布了 25 条观点(opinions) ,14 次专门的广播评论 ,还进行了众多外交活动 ,其绝大多数主题为伊朗核问题 ,包括阐释伊朗核武装的致命危险、支持和推动对伊朗实施制裁等。

即使不出现自杀式核打击的可怖图景 ,对以色列充满敌意的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 ,以色列也将其视为致命的威胁。以色列人担心 ,伊朗拥核将导致中东其他国家寻求发展自身的核威慑能力 ,由此 ,以色列的核垄断地位必然在一场核扩散中终结。^① 此外 ,伊朗拥有核武器还将导致以色列据以建国的锡安主义意识形态归于失败。自建国以来 ,以色列一直以全球犹太人天然的安全天堂的形象示人 ,吸引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以实现锡安主义运动“招聚全球流散犹太人”的使命。以色列领导人担心 ,一旦伊朗拥核 ,地区力量平衡就会发生巨变。伊朗的代理人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或实施其他恐怖行动; 伊朗还可能破坏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这样 ,以色列将不再是全球犹太人眼中的安全天堂 ,也将不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那些最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人才将会离开以色列 ,锡安主义事业将由此岌岌可危。^②

随着伊朗核危机的加剧 ,全球各地犹太领导人在伊朗核问题上频频援引纳粹大屠杀历史 ,提醒人们吸取大屠杀的历史教训。2009 年 9 月 24 日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他在发言中先阐明联合国的中心使命为防止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等令人恐怖的事件再次发生 ,而伊朗领导人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的言论挑战了联合国的这一使命。他将伊朗描绘成一个仍处于 9 世纪野蛮专制状态的国家 ,其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将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威胁。他说“如果这种最原始的狂热主义能获得最致命的武器 ,历史的进程就可能在某一时刻逆转。就像对纳粹姗姗来迟的胜利一样 ,进步和自由的力量只有在人类付出可怕的鲜血和财富的代价后 ,才能获得胜利。……(联合国) 最紧迫的挑战就是防止德黑兰独裁者获得核武器。”^③这一演讲将伊朗描绘成专制、暴虐、危险的力量 ,将以色列描绘成和平、文明的国家。他要求国际社会尽快行动起来反对前者 ,否则 ,历史的悲剧将会重演 ,人类将付出惨重代价。在 2012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上 ,他继续将伊朗描绘成充满末世情结的、非理性的行为体 ,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 ,将难以像苏联那样以核威慑来加以制衡 ,其危险性将与“基地”组织拥有核武器一样。伊朗领导人经常否定大屠杀并公开呼吁摧毁以色列 ,正是他所列举的伊朗核项目危险性的一大缘由。他公开呼吁国际

① Anoushiravan Ehteshami, “The Middle East’s New Power Dynamics”, *Current History*, Vol. 108, No. 722, December 2009.

② Jeffrey Goldberg, “The Point of No Return”.

③ Address by PM Netanyahu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4, 2009, 以色列外交部网站, http://www.mfa.gov.il/MFA/Foreign+Relations/Israel+and+the+UN/Speeches+-+statements/Address_PM_Netanyahu_UN_General_Assembly_24-Sep-2009.htm 2011-03-03.

社会(尤其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划出一条伊朗不可逾越的“红线”。^①

在 2012 年 4 月 18 日纳粹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纪念仪式上,参加仪式的以色列领导人也将伊朗核问题与纳粹大屠杀历史做了关联。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称,“今天,人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从纳粹大屠杀历史中吸取教训,并在时间太晚之前对生死存亡的威胁做出强有力的应对。伊朗就是这种威胁的中心。……没有理由低估以色列应对此种威胁的能力。”而总理内塔尼亚胡则称“我信赖我们保卫自己的能力。”“那些认为伊朗威胁只是幻想或者被夸大的人们,没有从纳粹大屠杀中学到任何东西。……像那时一样,今天还有人想要毁灭数百万犹太人。这就是贬低了纳粹大屠杀,冒犯了其受害者,忽视了教训。”^②两位领导人分别来自以色列左、右阵营,他们的认知代表并体现了以色列社会的共识。

在不同的场合,伊朗领导人还常被描绘成当下的“纳粹”。2008 年在华盛顿举行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活动上,以色列驻美大使将伊朗领导人与纳粹相提并论。他称“如果这儿(纳粹大屠杀历史)有一个教训,那就是当我们漠不关心时,一个嗜血成性的独裁者就可以制造大规模杀戮,压制自由并将整个世界置于危境。”^③2011 年 11 月,在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公布对伊朗核问题的报告后,一位与笔者保持着联系的纳粹大屠杀难民在给笔者的来信中写道“我们犹太人和以色列又陷入危难了,……伊朗人民是善良的,但他们的领导人像希特勒团伙及其本人一样邪恶。危险就在于,如果伊朗获得了核武器,那么末日就开始了。谁会被第一个扫除?犹太人。”

这种将纳粹大屠杀与伊朗核项目相提并论的意义架构方式,一方面是一种话语和修辞战略,借以表达威胁的严重程度和以色列应对威胁的决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大屠杀创伤记忆对以色列威胁认知的深刻影响。

三、大屠杀如何影响西方对伊朗核危机的认知和政策

自二战以来,纳粹大屠杀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确立是否符合“文明”标准的主要参照点。接受关于纳粹大屠杀历史的主流叙事,反对种族灭绝以及其他类型的严重侵犯人权罪行,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准,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言行在欧盟足以入刑判罪。如欧盟就将承认纳粹大屠杀作为能否进入“欧洲大家庭”的门票。与此

① Address by Benjamin Netanyahu,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at UN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7, 2012, <http://www.mfa.gov.il/MFA/Government/Speeches+by+Israeli+leaders/2012/PM-Netanyahu-addresses-UN-27-Sep-2012.htm> 2012-10-02。

② “Bibi, Peres Invoke Iran Threat During the Yom Hashoah Ceremony”, <http://www.jta.org/news/article/2012/04/18/3093176/israeli-leaders-invoke-iranian-threat-during-yom-hashvah-ceremony> 2012-04-19。

③ Address by Sallai Meridor, Israeli Ambassador to the U. S., May 1, 2008, at U. S. Capital Rotunda, Washington, http://www.ushmm.org/remembrance/dor/years/view_speech.php?content=2008&speech=meridor,2012-04-23。

关联,土耳其拒绝承认1915年曾对亚美尼亚人实行种族屠杀,就受到多个欧盟国家议会的谴责,并成为加入欧盟的一个障碍。^①纳粹大屠杀也是西方基督教与犹太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在主流的纳粹大屠杀历史叙事的角色分配中,西方国家和民族要么是屠杀犹太人的暴虐邪恶的施害者(纳粹德国等)和协从者(如法国维希政府、波兰人等),要么就是抛弃犹太人的“冷漠旁观者”(如英美)。时至今日,西方基督教世界对犹太民族还多少带有一种集体的愧疚和负罪感。从道义上、政治上、神学上对犹太民族实行补偿,修复基督教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西方主流社会未竟的事业。摒弃反犹主义,维护以色列生存和安全,正是对犹太民族进行补偿的政治要旨。一旦以色列安全面临严重挑战和威胁,西方就多少会产生某种需要“有所作为”的“特殊责任论”。

伊朗核危机正是此种历史阴影下西方对犹太(以)“特殊责任论”的一个典型例子。西方国家一方面担忧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示“理解”以色列在这一问题上的安全焦虑,并对伊朗实施谈判、严厉制裁、战争威胁等多种举措来回应以色列的焦虑和压力。

比如美国,军事打击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十年反恐战争带来的惨重代价,使它在伊朗核危机问题上对再次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持高度谨慎的态度。但与此同时,它又一再表示以色列有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利,并一再重申其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在2012年4月23日举行的大屠杀纪念日活动上,奥巴马在发言中表示“‘永不重演’要求捍卫包括以色列国在内的自由民族和自由国家和平安全生存的权利。在我访问旧华沙隔都(Ghetto)时,……我就承诺……我将一直与以色列站在一起。”“面对一个威胁全球安全、否定大屠杀并威胁毁灭以色列的政权,美国将尽其所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②此类言论显然在大屠杀历史与当下的伊朗核危机之间建立起了意义关联,用以表达其反对伊朗核武装、保障以色列安全的道义正当性。伊朗核问题还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成为两党候选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在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这一点上形成了基本的共识。

在美国,强大的犹太社团正是维系美国决策者长期推行偏袒以色列政策、对以色列承担安全保护责任的强大力量。德国并不存在强大的犹太社团,但维护以色列安全也是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使命。自二战以来,德国对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持一种非常谨慎的姿态,以免刺激国际社会(尤其邻国)的敏感神经,但却经常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向以色列大量提供先进武器以提升其防卫能力。还有许多德国和奥地利人在以色列做志愿者,或以其他方式努力为犹太民族作贡献。在德国人看来,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是一种“道义”责任。德国默克尔政府尤其将保障以色列的安全

① (美)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上)林骥华、唐敏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年,第742页。

②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http://www.whitehouse.gov/>, April 23, 201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4/23/remarks-president-united-states-holocaust-memorial-museum>, 2012-04-24.

视为自身的特殊历史责任,是不可谈判的“国家最高利益”(Reason of State)^①。2008 年 3 月 18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将造成“灾难性”后果,以色列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她重申德国对以色列安全负有特殊的历史责任,将之界定为德国政府基本政策的一部分。^②在众多国际场合,德国领导人一再重申此种立场。用德国媒体的话说,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德国人曾带给犹太人的痛苦和毁灭之上的。^③

德国在以色列安全问题上的“特殊责任论”,在“格拉斯风波”中充分表现出来。2012 年 4 月,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发表了题为《不得不说》的诗歌:批评以色列发展核武器对世界和平构成了威胁;反对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批评德国政府偏袒以色列,反对德国向以色列出售潜艇。格拉斯的观点表达了德国社会对以色列可能发动单边军事打击破坏世界和平的忧虑,支持此种立场的人在德国社会中并不少见。但格拉斯的诗作一发表,德国主流媒体表现出难得的一致,各家媒体纷纷与格拉斯划清界限,几乎看不到赞成格拉斯的言论,而且批评文章的严厉程度、贬斥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德国政治体制内各党派的领导人物,包括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等,都纷纷表示反对格拉斯诗作中的观点。历史包袱使涉及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话题在德国变得十分敏感,批评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政策更成为禁忌。^④格拉斯的诗作正好挑战了这一禁忌。

伊朗领导人否定纳粹大屠杀、反犹反以言论,由此一次次挑战了西方关于“文明”的标准和禁忌,并不断揭开西方文明内在的创伤。这些言论也成为导致伊朗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因素。2005 年 10 月内贾德发表关于“扫灭”以色列的言论后,马上就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欧洲多国纷纷召见伊朗大使要求解释。西方各国纷纷强烈谴责这一“不负责任”的言论。英国首相布莱尔表示“反感”和“非常愤怒”,法国总统希拉克则表示“深为震惊”。^⑤2006 年 12 月伊朗召开否定纳粹大屠杀的国际研讨会不久,欧洲理事会就通过决议,谴责内贾德发表否定纳粹大屠杀、“扫灭以色列”的言行。^⑥两天后,联合国大会推出由美国起草并有 104 国共同提案的决议,毫无保留地谴责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做法。在与会成员国代表中,只有伊朗反对这一提案,因此该提案未经表决即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

反以立场和否定纳粹大屠杀言论,还进而导致西方怀疑伊朗核项目的意图。

① Oz Aruch, “Reevaluating Germany’s Commitment to Israel’s Security”, in *The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Vol. 7, No. 1, 2013, pp. 45—58.

② “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新华社耶路撒冷 2008 年 3 月 18 日电。

③ 刘向《德国“反犹”诗歌引发的震荡》,《国际先驱导报》2012 年 4 月 23 日。

④ 严建卫《德国: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汇报网站,http://whb.news365.com.cn/gj/201204/t20120411_354730.html 2012 年 4 月 20 日登录。

⑤ “Iranian President Calls for Israel’s Destruction: Responses from World Leaders”, http://www.adl.org/main_Anti_Semitism_International/iran_responses.htm 2008-12-10.

⑥ “Condemn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ments of the Iranian President”, January 25, 2007, Council of Europe, Document 11161.

2005年10月内贾德发表“灭以”言论后,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称“我想它(‘灭以’言论)验证了我们关于伊朗政权所说的,它也使更加关切伊朗核项目的动机。”欧洲国家也都由此对伊朗核项目的动机纷纷表示质疑。^①在社会层面,西方也有许多强大的群体对伊朗政府的反犹、“灭以”言论和否定纳粹大屠杀极为不满。高度亲以的美国福音派基督教牧师约翰·哈吉(John Hagee)在2007年的一次会议上称:“伊朗对以色列国的威胁不亚于用核武器实施大屠杀。要是在1938年,伊朗就是德国,内贾德就是新希特勒。”即使在巴以和平进程问题上对以色列常有“微词”的主流派基督教组织“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Churches)也将伊朗视为“和平之敌”,该组织在2008年9月针对内贾德否定纳粹大屠杀言论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任何……文明民族必须不让种族灭绝历史的修正主义者获得可信度。重写邪恶事件的反犹努力危及犹太民族,使仍然保持沉默的……信仰群体蒙羞……这种话语使人们难以信任此人所说的其他事情。如果内贾德总统无视历史事实的可信度……那就很难相信他所坚称的伊朗核项目的和平目的。”^②

内贾德政府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及其激进的反西方言论,也导致西方国家民众对伊朗的敌意上升。根据盖洛普公司的一项民调,美国民意将伊朗视为“首要大敌”的比例迅速从2005年的14%跃升为2006年的31%,此后一直维持在大约25%的高位,高居榜首。^③

当然,对于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大屠杀记忆并非影响它们对伊朗核问题政策的主要动因。当下西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以压促谈”政策,主要还是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但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不让以色列在恐惧焦虑中过早贸然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袭击,导致许多不可控制的灾难性后果。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核问题正变得日益危险和紧迫,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政策也日趋强硬,发动军事打击的呼声不断上升。如果“以压促谈”的政策不能明显奏效,那么,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就将获得西方国家更大的同情和支持。

四、简短的结语

在伊朗核危机问题上,大屠杀记忆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和道义的质素。它显然成为以色列认知伊朗核项目所隐藏的安全威胁、界定其国家利益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一些西方国家对以色列和犹太民族的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历史和道义依据之一。对于以色列而言,大屠杀记忆既是其采取强硬政策的重要动因,也是支持

① “Iranian President Calls for Israel’s Destruction: Responses from World Leaders”.

②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The Enemy of Peace”, see <http://www.nccusa.org/MK.ahmadinejad.080922.html>, September 22, 2008, 2009-01-25.

③ Jeffrey M. Jones, “Americans Continue to Rate Iran as Greatest U. S. Enemy”, February 18, 2011, <http://www.gallup.com/poll/146165/Americans-Continue-Rate-Iran-Greatest-Enemy.aspx> 2011-02-20.

其强硬政策的话语和修辞手段。当然,军事打击事关重大,后果难料,以色列和西方均会依据关于伊朗核项目进展的实时情报,综合考量威胁程度、应对能力及其潜在后果等多种因素加以决定,意图只是影响行动的一个方面。能力的不足以及对管理灾难性后果的顾虑,严重制约着对军事行动的选择。^①

历史经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集体记忆,是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屠杀、战争之类的创伤性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尤其深远。集体记忆广泛渗入群体的集体身份建构、社会规范塑造和权力合法性分配的进程中,为群体提供共享的记忆、情感和使命,确立共享的规范和信念,为群体成员提供精神聚合点,提供自我认知和定位的标准和指针,群体成员由此确立其对于群体的归属感和角色分配。集体记忆还往往成为人们理解当下情势的棱镜,改变群体之间的道义资本分配,塑造出对某些情境敏感化的群体,形成人们行为和政策选择的“路线图”。由此,集体记忆在政治上就产生了战略利用的价值,经常被政治活动家以类比或借喻等方式唤起,用于意义架构和社会动员,并为某种政策进行辩护和宣传。无论在个体、群体还是国际层次,基于记忆的情感和情绪或激情,广泛影响着社会政治事务。中日两国民众基于历史记忆而一直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9·11”事件后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和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此类集体记忆影响国际政治的鲜活事例举不胜举。“向前看”往往需要建立在关于历史和记忆的某种程度的共识的基础上。群体尤其无法轻易超越和抛弃其集体创伤记忆。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有一个集体记忆视角。

^① 关于在伊朗核问题上以色列在军事打击意图、能力方面的一致性,笔者深受北京大学吴冰冰教授的启发,在此深表谢意。